

后危机时代浙江省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

毛伟

【摘要】从统计数据上看,①浙江省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长三角地区处于偏弱地位。由此造成的不利影响是,浙江经济的抗风险能力弱并且与邻居江苏省的经济差距持续扩大。浙江省自主创新能力弱的根源在于,当外部产业环境表现为高进入壁垒时,以民营化和市场化为特点的发展模式把浙江经济的发展锁定在一条低水平的路径之上。因而,破解这一难题的出路在于理清市场和政府两种机制下的自主创新规律,以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为目标,通过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的相互配合来推动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关键词】金融危机;浙江经济;自主创新

【作者】毛伟,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专业博士生;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助理研究员。(杭州 310025)

2007年美国爆发次贷危机后,全球经济陷入动荡。各国政府相继大力推行凯恩斯主义,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增长。此种景象似乎让人以为时光又倒流至1935年。1929年发生的资本主义大危机为凯恩斯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极好的时代背景,使得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正式出版的前一年(1935年),就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焦点,甚至迅速上升到经济学《圣经》的地位。以至于在一次讨论会中,凯恩斯自嘲自己是与会者中唯一的非凯恩斯主义者。正如后来一些批评者所指出的那样,凯恩斯主义实质上是一种萧条经济学,他的目的在于避免经济陷入长期的非理性的衰退,但并不能用来制造繁荣。那么如何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繁荣?在经济学大师熊彼特看来,无论“从技术上以及从经济上考虑,生产并没有在物质意义上‘创造’什么东西。”^②因而,他将经济发展定义为“执行新的组合”,^③从熊彼特“创新理论”的视角来看,创业家把资源从旧有的失去活力的生产项目转移到新生的更富生产力的生产项目里,构成了经济持续发展的源泉。作为经济大省的浙江,在改革开放以来的30多年里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在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前,以小企业,小商品为特点的浙江经济显得特别脆弱。加快以自主创新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对于浙江而言尤显重要。

一、自主创新赢弱的困境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逐渐发展形成了“轻、小、民、加”的产业结构特点,即轻重工业结构中以轻工业为主,企业规模结构中以小企业为主,所有制结构中以民营经济为主,产业链结构中以加工制造为主。但这种产业结构在促进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使浙江经济的发展出现了产业层次低、企业规模小、生产力布局离散、自主创新能力弱等“低、小、散、弱”的问题。^④在这些问题上,自主创新能力弱无疑处于关键位置。正是因为自主创新能力弱,才使产业层次无法提升、企业规模难以扩大和生产力布局不能集中。

从统计数据上看,可以发现与同处长三角的沪、苏二省市相比浙江的技术创新能力偏低,有些指标甚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与经济大省的地位很不相称。2008年,全省研发经费(R&D)投入345.76亿元,占生产总值的1.61%,仅高于全国0.07%,与上海(2.59%)、江苏(1.92%)等同处长三角地区的省市相比存在一定差距;在专业技术人员数量上浙江为每万人166.78人,而全国仅国有企事业单位就达到了179.93人,也低于江苏的185.31人。从2008年授权专利数来看,尽管浙江省的所授专利大多集中于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实用新型和外观专利上,但每万人发明数达到0.64件,虽与上海的2.26件差距较大,但高于全国的0.35件和江苏的0.46件;表明以民营经济为主体和市场机制为导向的浙江经济具有较强的内在创新动力。但与此相悖的却是创新效益并不理想。例如,2008年浙江省技术市场交易额仅为当年GDP的0.51%,低于全国的0.88%,也低于上海的4.78%和江苏的0.63%。另外,众多研究(吕宏芬、池仁勇,2008;刘艳萍,2009)还表明:在长三角三省市中,浙江省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

最低的。通过对统计数据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浙江的技术创新具有创新投入低、创新效率高和创新效益差的特点。总体而言,浙江省的自主创新能力在长三角地区处于偏弱地位。

自主创新能力弱,尤其是技术创新能力弱的局面已经对浙江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些非常不利的影响。一是抗风险能力差。在这次金融危机中,这一点表现得非常明显。自金融危机爆发后浙江的 GDP 增速从 2007 年的 12.9%迅速回落至 2008 年的 8.6%;2009 年一季度竟然跌落至 3.4%,而同期全国的 GDP 增速则为 6.1%。(见图 1)^⑥GDP 跌速如此之大,除了浙江经济出口依存度过高之外,^⑦更重要原因在于长期以来,浙江企业重市场创新而轻技术创新,延缓了经济转型升级步伐,产业竞争力薄弱。二是与江苏的差距持续拉大。2003 年以来,浙江与江苏的 GDP 差距不断扩大。(见图 2)2003 年浙江与江苏 GDP 之比为 0.78,而 2009 年降至 0.67。通过对浙、苏两省制造业结构进行简单的比较就能发现原因之所在。2008 年浙江省的重工业与轻工业生产总价值之比为 1.4,而江苏则为 2.7,几乎是浙江的两倍。从制造业内部结构看,2008 年浙江比重最大的仍为纺织服装、鞋、帽制造业,占比为 11.81%,而江苏则是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它电子设备制造业,并且占比高达 15.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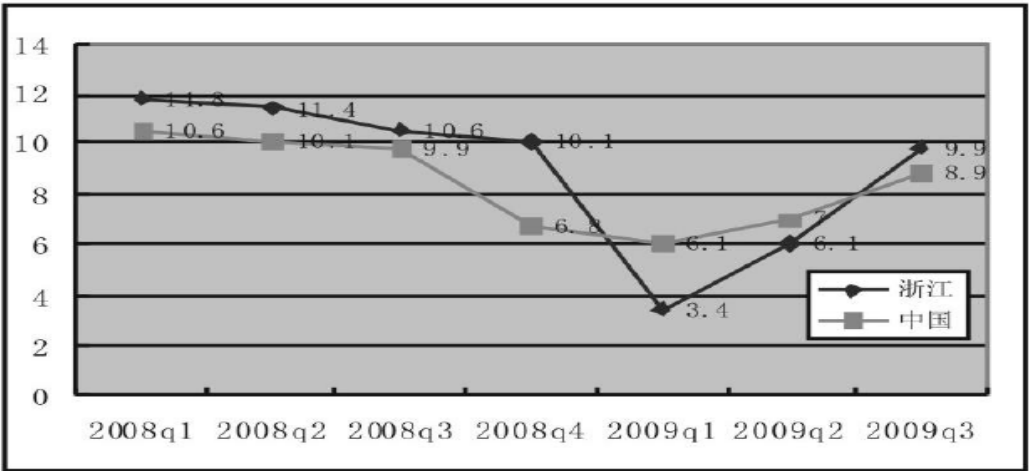


图 1 全国和浙江 GDP 增长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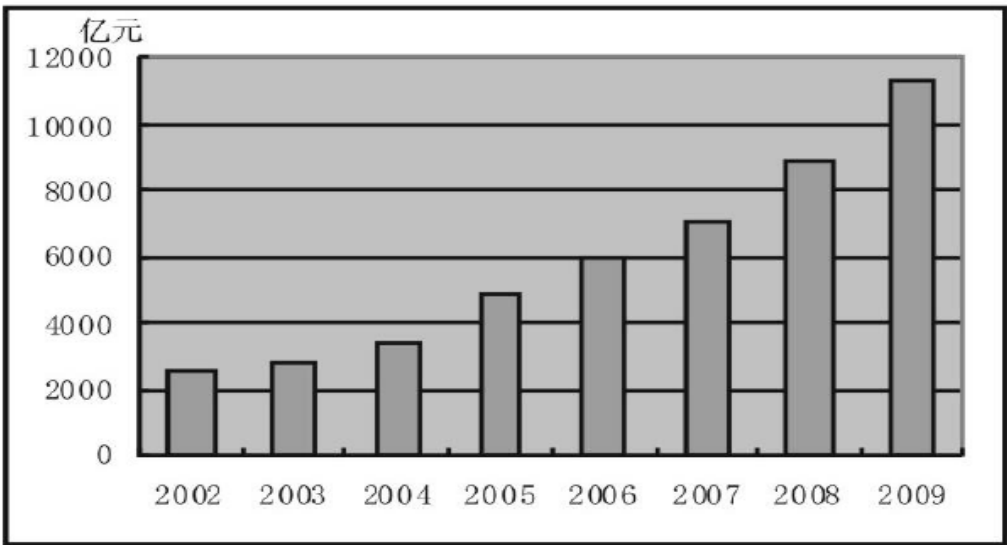


图 2 江苏与浙江 GDP 之差

从国内国际形势看,自主创新不足导致经济转型困难的后果还有加重的趋势。国内方面,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劳动力成本、原材料及能源价格有持续上涨的趋势;同时为应对金融危机所推行宽松的宏观经济政策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资产价格尤其是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这些因素必然会增加企业的经营成本,一些缺少竞争力的企业将面临越来越大的生存压力。另外,当前全国各省市都确立了新一轮创新发展战略,各省市在创新要素方面的竞争异常激烈。尤其是与浙江同处长三角地区的沪、苏两地在取得产业先行优势的基础上,对创新人才、创新技术、创新平台等创新要素吸引力持续增强。这将直接导致浙江经济的发展面临被“技术边缘化”和“产业中空化”的威胁。国际方面,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在美国失业率居高不退和欧债危机阴霾不散的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蔚然成风。可以预见,外部需求萎缩的状况短期内难以改观。同时,人民币对美元、日元、欧元等汇率的持续走强以及国家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将进一步削弱浙江对外出口的竞争力。可以说,浙江经济在目前及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面临内忧外患的局面。

二、自主创新困难的根源

回顾浙江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民营企业 and 市场机制的优势起着关键性的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当这种优势与日用消费品需求旺盛的市场环境相结合时,迸发出强大的增长动力,并迅速促进了浙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史晋川(2005)将这种由内生的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模式称为“浙江模式”。但是,必须认识到“市场失灵”的存在可能使这一模式具有不可避免的内在缺陷。金祥荣(1998)就曾指出,这种模式使“浙江经济发展正在逐步陷入一种以古典经济结构为主要特征的模式锁定,并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尤其是当民营企业的发展受到国有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竞争压力时,锁定效应被进一步加强了。分析浙江自主创新和经济转型困难的根源应当与其自身的经济发展特点和所处的经济环境相联系。

(一) 市场机制与创新效率

无论是何种类型的创新,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这种创造过程需要在一定知识积累的基础上进行艰苦的脑力劳动,因而蕴含着巨大的失败风险。市场机制下,创新的高风险性会导致创新的低效率。从投资决策的角度来看,创新的高风险性导致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创新收益的不确定性。创新收益的大小取决于创新成功后该创新在市场上的垄断力和需求量,但这两个因素在创新成功前都是无法准确预知的。二是创新成本的不确定性。创新成本包括创新的资金和时间成本,当然这些成本在创新成功之前也是未知的。创新收益和成本的不确定又通常是相互影响的。例如研发时间超过预期导致竞争对手先入为主,那么这项创新活动在增加了成本的同时也减少了收益。正由于创新的高风险性,作为风险厌恶型的投资者来说,他们更偏好于短期的投机性资本收益。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创新困难表现为创新的制度安排是低效率的。以技术创新为例,企业要得到新的技术可以通过购买和自创两条途径。新技术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使得买卖双方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非常严重,致使用买卖方式达成交易的可能性很低。一般情况下,对于有价值的新技术研发者并不会将其出售,而是更愿意利用对新技术的垄断以获得尽可能多的超额利润。技术市场中更可能出现交易的是相对成熟的旧技术,因为通过市场检验后的旧技术的价值能够很容易被观察到,买卖双方达成交易的可能性就比较大。通过雇佣科研人员来自创新技术的效率也是很低的。理由很简单,研发新技术是一项高风险的事情,致使雇主无法确定研究失败的原因是科研人员的偷懒还是运气不佳。因而无论是通过买卖契约还是雇佣契约来研发新技术都是无效率的。

从演化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产业创新过程是一种负反馈机制。演化经济学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为理论依据,将企业的创新视为生物学中的基因突变,“好”的基因通过“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规律得以延续。在达尔文的进化论中“天”表示自然环境,说明生物进化是在“自然选择”的过程中进行的。但人类社会发展与生物进化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类的创新活动不仅要面对自然环境的选择,还要面对社会环境的选择;原因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活动与社会环境变动之间是互动的。这种互动一方面表现为竞争对于创新的激励;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优胜劣汰机制导致的产业集中度提高会削弱竞争。也就是说,创新活动本身降低了企业

创新的动力,这一负反馈机制将使某一产业创新的可能性趋于减少。

(二) 民营企业与创新效率

关于企业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熊彼特强调大企业和垄断力在创新中的重要作用,即著名的“熊彼特假说”。^⑦随后涌现出大量的经验性研究,试图对此假说进行验证。然而研究结论却是莫衷一是,有些甚至大相径庭。毫无疑问,成功的创新能够扩大企业规模,增强企业垄断力,但在这个过程中因果关系之间很可能是相互促进、互相影响的;这种因果关系上的复杂性必然导致检验结果的多样性。而且,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一些案例本身就能表明:企业规模、市场力量与创新效率之间并不必然存在正相关关系。比如,我国的一些国有企业(中石化、工商银行等等)规模很大,垄断力也很强,但没有证据表明它们的创新力很强。前文有关专利授权数的统计数据也表明,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浙江企业在创新动力上并不低。因而,对民营企业与创新效率关系问题的研究应该从企业的规模属性转移至民营属性。

罗卫东(2002)就曾指出:浙江的民营企业具有家族本位制的特点,其表现为家族内部的高度信任和家庭之间的高度不信任;他分析认为正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浙江民营企业的规模小、产业层次低、高度依赖于专业市场和产业集群等特点。从创新的角度来说,也正是这个原因使浙江的民营企业更多地依赖于市场创新和渐进性创新。^⑧比如史晋川(2008)发现,尽管浙江的产业结构与国内消费需求结构的不协调性从“九五”后期就已开始显现,但浙江的民营企业并不是通过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来应对国内消费结构的变化,而是利用中国入世的有利时机通过实施国际市场需求替代国内市场需求策略求得发展。从短期看,此种策略对于浙江的民营企业而言无疑是收益最大化的,但从长期的角度来看民营企业本身的特点所引致的最优策略又使浙江经济发展被锁定在一条低水平的路径之上。

(三) 产业环境与创新效率

以民营化和市场化为特点的浙江经济在改革开放初期能够迸发出巨大的增长能量,而进入21世纪之后为何增长乏力呢?显然除了市场机制和民营企业在创新激励方面具有内在缺陷之外,产业环境因素变化的影响也相当重要。一是制造业的进入壁垒增强了。改革开放初期,浙江体制机制优势能够得以发挥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消费品制造业的技术壁垒很低。许多家庭工厂通过聘用退休工程师和星期天工程师就使自己茁壮成长起来。而目前的形势是,国有企业拥有垄断优势、外资企业拥有技术优势,民营企业只能利用成本优势挣扎于进入壁垒较低的劳动密集型产业。2003年,吕祖善省长就提出浙江省民营经济的发展必须实现二次飞跃。^⑨但现在看来,在强大的进入壁垒面前浙江民营经济要从日用消费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进入汽车、电子信息产品等技术密集型产业的难度还是非常的大,并没有出现明显的二次起飞迹象。

二是区域产业集聚效应的影响。藤田昌久等(2005)建立了一个以垄断竞争、规模报酬递增为基础,刻画了异质性企业如何在运输成本降低的情况下从分散到集聚的数理模型(中心—外围模型)。对于传统的技术密集型产业来说,其市场结构的垄断竞争性和产业的规模报酬递增是非常明显的,因而存在强大的产业集聚效应。从产业结构上看,江苏的重轻工业总产值之比是浙江的近2倍,上海则是浙江的近2.6倍。从工业园区的建设上看,江苏的苏州工业园区和上海的漕河泾开发区充分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经过近20年运作,发展已经相当成熟,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与此相对照的是杭州的江东工业区才刚刚处于发展的初期,差距非常明显。与改革开放初期相比,当前上海、江苏对浙江的产业先发优势已相当明显,由于产业的集聚效应,使得浙江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有被边缘化的趋势,有成为中心—外围模型中所描述的“外围”的危险。

三是区域集群效应的影响。与产业集聚不同,产业集群侧重于相关企业和机构集中于某一地区而形成的有机整体的描述。^⑩笔者以为众多中小企业用集群的形式以求生存和发展的现象之所以存在,原因在于一些产业因创新过快和创新不足而无法使单个企业构建起有效的进入壁垒进而形成垄断力,所以产业的发展不得不用集群的竞争力取代单个企业的竞争力。J. Humphrey and Schmitz(1995年)把产业集群分为两类:创新型产业集群和低成本型产业集群。美国的硅谷高新技术产业群属于前者,而浙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集群则属于后者。对于创新型产业集群来说,集群所带来的知识外溢性能够加快整个产业集群的创

新速度。但对于低成本型产业集群而言,知识外溢只能降低生产成本而不能促进创新。^⑨更为不利的是,产业集群的竞争优势对企业竞争优势培育的替代会将众多小企业长期锁定于低层次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之中。

三、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

从前文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浙江经济的发展模式在外部产业环境变化的情况下,暴露出自主创新能力薄弱的弊端。这一弊端的产生是由民营经济和机制自身特点所决定的。因而破解这一难题的出路在于理清市场、政府两种机制下的创新规律,以创新型产业集群建设为目标,通过市场和政府两种手段相互配合来推动浙江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和加快经济的转型升级。^⑩对于浙江而言,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入手来加快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

(一)以创新为导向制定产业发展规划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主要从加快工业化进程的角度来研究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例如强调在整个工业或国民经济各个部门中同时进行大规模投资的平衡增长理论,以及强调集中资源重点发展具有强联系效应产业的不平衡增长理论。^⑪(谭崇台,1989)对于中国经济以及浙江经济来说,经过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已经进入工业化的中后期,这一时期以资本积累和快速工业化特征的外延式经济增长方式已经不合时宜。与工业化初期相比,制约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已经从资本积累不足转变为自主创新能力不足。因而需要从加速自主创新的角度来重新研究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⑫

基于不平衡增长理论的三大发展战略的目的在于在有限的资源条件下如何取得最快的经济发展速度。但从创新角度看,三大战略指明了产业创新的方向。也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突破性创新会从国内已有的产业转向国内没有的产业,会从消费品制造业转向装备制造业,会从技术含量低的产业转向技术含量高的产业。但正如众多发展经济学家所观察到的那样,在市场机制下,创新的这种方向性转变是困难的,甚至可能是长时期停滞不前的。因而民营经济需要借助政府的力量,依靠政府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实行以及相关优惠政策的提供来加速创新的方向性转变。

政府可以在两个方向上制定产业规划。一是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产业创新规划。就制造业而言,中国目前的消费结构已经从日用消费品向汽车、电子信息产品等高档消费品转变。但这些产业或者产业的核心环节又往往存在着很强的进入壁垒,民营经济需要在政府力量的支持下来降低创新风险。^⑬一旦民营经济在这些产业站住脚跟,就能利用自身体制机制上的优势加快产业创新赶超速度。同时,在技术外溢的作用下,一些内资企业已经在汽车、电子信息产品等高新技术产业中成长起来。例如,汽车产业中的比亚迪、吉利和奇瑞;CUP产业中的江苏龙梦和北大众志。浙江民营经济只有在政府的帮助下抓住技术转移机会及时转变创新路径,使自己的产业结构与我国当前的消费结构相适应,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二次飞越。二是新兴产业发展的规划。新能源、新材料等新兴产业代表着未来产业发展的方向,但同时由于是在全新的技术路径上创新,其风险性也是巨大的,需要政府制定产业规划予以支持。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制定相应的规划,浙江省应该利用国家支持的契机,组织力量进行研究和规划,力争能够走在全国的前列。

(二)以工业园区为依托培育创新型产业集群

在工业园区建设上,浙江省已大大落后于江苏省。在新加坡中盛集团公布的中国工业园区10强名单中,江苏省的苏州工业园区、昆山开发区和苏州高新区分列第二、第四和第八名,而浙江省的工业园区无一入围。工业园区的建设并不仅仅是将大产业、大项目和大企业装入工业园区这个大平台之中那么简单。其重点在于利用这一平台进行产业集聚功能的培育,进而建立起具有极强竞争力的创新型产业集群。首先,政府不仅需要制定产业发展规划,还要制定产业布局规划。产业发展规划的制定需要与工业园区所在地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避免不同地区工业园区之间的恶性竞争和重复建设。否则,工业园区的产业集聚功能会被极大地削弱。^⑭其次,必须认识到创新型产业集群的建设是一个长期的系统性的工程。它包括公共服务平台的建设、企业间创新网络的培育以及区域内创新文化的形成。这些创新要素的形成与积累往往需要一个过程,要避免为了短期利益而牺牲长期发展。再次,

在工业园区企业引进方面,要以鼓励和发展民营企业为重点。从赶超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一般需要经历引进外资、引进设备、引进技术到自主创新四个阶段。江苏、广东等省依靠外资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并且取得了先发优势,但他们今后必定会向由内资主导的引进设备技术以及自主创新的方向发展。与江苏、广东相比浙江的区位优势并不明显,如果仍走大力引进外资的老路不大可能建立起有效的产业竞争优势。目前,浙江一大批民营企业已经走上发展技术密集型产业之路,并且很多已经成为上市公司。因而,建立以民营企业为主体的创新型产业集群不仅在方向上是正确的,在条件上也是可行的。

(三)进行以创新为导向的教育和文化制度

改革教育是创新型发展中的关键因素。首先,创新需要依赖于教育部门所创造的科技人力资源。目前,我省科技人力资源仍然比较贫乏。据科技部科技人力资源指数评价指标,浙江省科技人力资源指数仅为 51.27%,在全国列第 15 位。^①尽管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的“农民企业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奇迹,但是受知识面狭窄的限制他们必将与时代的发展相脱节。对于现代经济来说,要实现创新型发展必须依赖于既懂技术又懂管理的创业家,必须依赖于掌握先进科学知识和技能的专业技术人员。其次,产学研合作已经成为创新的一种重要方式。20 世纪 50 年代,在斯坦福大学工业园的建立并因而创造出“硅谷”经济奇迹后,对产学研合作的研究已成为世界各国日益重要的课题。对于浙江的广大中小企业来说,限于自身经济实力往往无力担负巨额的研发费用,此时通过产学研合作的方式来促进产业集群的创新就显得特别重要。因而,浙江需要改变目前以发表论文数量为导向的高校教育机制,切实研究产学研合作机制以提升产学研合作成效。

产业集群的形成需要一种支持性的社会结构,文化便是其中的重要因素。区域文化通过影响经济活动的交易方式、学习模式、信息和知识的流动等途径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式。依靠文化的导向和凝聚作用,集群内企业间的非契约关系会变得较为稳固,使合作创新变得更加容易。长期以来浙江地区形成了“善进取,急图利”的功利主义价值观,这种价值观成为浙江内生性产业集群形成的文化基础。但是,浙江的区域文化中也存在着一些消极因素,阻碍了创新型产业集群在浙江的形成。主要表现为,以血缘和地缘关系为主的社会网络关系、重模仿轻创新的学习方式以及封闭性的知识交流环境。因而,必须进行必要的文化体制改革,努力培养鼓励冒险、善待失败、乐于合作的文化氛围,促成创新性网络的形成,使创新型产业集群尽早根植于浙江大地。

注释:

①本文数据无特别说明均来自 2009 年《中国统计年鉴》、《浙江统计年鉴》、《浙江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江苏统计年鉴》、《江苏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或经计算得到。

②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17 页。

③共包括五种情况:采用一种新的产品;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开辟一个新市场;掠夺或控制原材料或半成品的一种新的来源;实现任何一种工业的新的组织。参见:约瑟夫·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73 页。

④参见郭占恒:《“十二五”浙江转型升级的基本思路》,《浙江经济》2009 年第 23 期。

⑤转引自浙江省人民政府咨询委员会课题组:《危机影响下的浙江经济增长与转型》,《浙江经济》2009 年第 24 期。

⑥ 2008 年,浙江省的出口依存度为全国的 3.05 倍。

⑦在熊彼特的早期研究中他强调发明家兼企业家(创业家)和小企业在创新方面的优势;在观察到大企业和垄断力量在创新中的作用后他转而提出所谓的“熊彼特假说”: (1)大企业比小企业承担着更大比例的创新份额; (2)市场力量与创新之间存在着正相

关关系。(吴延兵, 2007)

⑧渐进性创新是对现有技术改进引起的渐进的、连续的创新;突破性创新是指改变了原有技术发展路径的创新。由于突破性创新脱离了原有的技术轨道,并且往往处于新的技术轨道的前端,因此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⑨参见吕祖善:《抓住机遇发挥优势推动浙江民营经济二次飞跃》,《今日浙江》2003年第18期。

⑩按照波特的说法,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产业联系密切的企业以及相关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竞争优势的现象。参见陈劲、王焕祥编著:《演化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8页。

⑪或者说对于低成本产业集群而言,其发展更多地依赖于渐进式创新而不是突破性创新。

⑫市场机制是一种成本最低的创新激励制度安排。在市场的引导和激励下,创业家的创新活动能够把资源引向正确的创新之路上,从而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了动力。但其劣势是,在产业形成一定的进入壁垒后市场机制对创新的激励作用就会大幅减弱。所以市场机制对新兴产业的发展更具激励作用。对于政府而言,优势之一是能够通过制度设计强化市场机制对创新的激励作用,比如专利制度、政府采购制度;优势之二是能够在短时间内运用大量资源进行集中式创新,比如军事工业。而政府手段的劣势是实施成本很高。一是政府部门的运作需求依赖于庞大的官僚集团;二是当集中式创新与市场机制相悖时会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

⑬以不平衡增长理论为基础,演化出了进口替代、重工业化和主导产业优先三大发展战略。

⑭浙江省“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强调了这一转变的必要性,但今年“四大(大平台、大产业、大项目、大企业)”建设的发展路线似乎又回到外延式扩张的老路上并且还具有某些“大跃进”时代的痕迹。

⑮例如:提供税收优惠、提供政府采购合同等等。

⑯例如上海在2003年就已经制定了《工业产业导向及布局指南》,同时在产业发展和布局上做出规划。

⑰转引自杜康等:《浙江省民营企业自主创新能力调研报告》, <http://www.zjkjt.gov.cn/html/detail.jsp?xh=13521>。

参考文献:

1. 吕宏芬、池仁勇:《江、浙、沪技术进步贡献率实证分析》,《科技管理研究》2008年第8期。
2. 刘艳萍:《长三角地区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度量与比较》,《当代财经》2009年第9期。
3. 史晋川:《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浙江模式”研究》,《浙江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4. 金祥荣:《“浙江模式”的转换与市场创新》,《浙江学刊》1998年第1期。
5. 吴延兵:《企业规模、市场力量与创新:一个文献综述》,《经济研究》2007年第5期。
6. 罗卫东、许彬:《社会资本、家族企业与浙江经济》,《浙江经济》2002年第10期。

-
7. 史晋川:《浙江经济转型刻不容缓》,《每日商报》2008年7月27日。
 8. 藤田昌久等:《空间经济学——城市、区域与国际贸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 Humphrey J., Schmitz, “Principles for Promoting Clusters & Networks of SMEs”, Paper commissioned by the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 Branch, 1995.
 10. 谭崇台主编:《发展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